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重要文獻之評介

The Geographical Links of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 Review

doi:10.6154/JBP.1996.8.010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8), 1996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8), 1996

作者/Author：王志弘(Chih-Hung Wang)

頁數/Page：117-12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6/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6.8.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地理學鍵結 —重要文獻之評介—

王志弘*

The Geographical Links of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 Review

by
Chih-Hung Wang*

摘 要

本文整理與評論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論戰中，有關地理學和空間隱喻的課題。第一部份整理了數位女性地理學者對於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異同的發言，指出女性主義堅持改變性別不平等之現狀的政治立場，有條件地採用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論點，並揭露後現代主義裡的性別盲目與壓迫。第二部份從後現代主義擅用的空間隱喻切入，討論這種空間隱喻裡所暗含的性別問題。最後，本文試圖在既有文獻的基礎上，針對女性主義之基進空間政治，提出幾個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人文地理學、空間、空間隱喻、空間政治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review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issues in the debates between feminisms and postmodernisms. The first part of this article abstracts the opinions of several female geographers about the debate between feminisms and postmodernisms. They insist that the political goal of feminist theories is to overthrow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 while postmodern theories often reveal traces of gender inequality and gender blindness. In the second part, it will take the issu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postmodern theories, and discuss the gender and sexual implication of these metaphors. In the final part of this paper, it will propose four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eminist radical politics of space.

Keyword: feminism, postmodernism, human geography, space, spatial metaphor, politics of space

收稿日期：民國84年7月。通過日期：民國84年10月。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與人文地理學的會遇

在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裡，我們正目睹百花齊放的年代，各式各樣時新的理論和概念不斷進現，互相推擠、衍生、散播，穿透了學科的既定界線。這些理論和概念的進展，經常伴隨了學界激烈且複雜的辯論和反省，在多方交火辯詰之中，或匍匐前進，或跳躍超趕，織就一幅混亂無邊的地圖。不過，在當代的知識風暴裡，隱然有一個核心，那就是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論戰。

後現代主義所引發的風潮，也波及了女性主義和人文地理學的陣營，不過後面兩者的回應不太一樣。女性主義者站在女權運動的政治立場與實踐策略上，針對後現代主義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提出了進一步的檢視，思索挪用後現代主義的有利論點，而避免其弊端的可能性，一方面針對後現代主義的政治立場提出女性主義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尋索締結同盟的機會。

人文地理學家對於後現代論述中常見的空間隱喻非常感興趣且受到鼓舞，因此，除了一方面引進後現代的認識論批判，來檢驗地理學本身的理論建構與預設，另一方面也延續一九八〇年代與社會理論的雙向交流，冀求在後現代的喧囂中發出地理學以空間為專業的獨特聲音。

女性主義立場的人文地理學者，在後現代主義的論戰中身兼兩種身份，特別能夠批判性地檢視空間議題的性別相關性，更為緊密地扣著政治行動來思索空間議題的顛覆潛能，而不只是滑入理論的臆想。

本文檢視幾位重要的女性主義人文地理學者(恰巧也都是女性)對於後現代問題的發言，為了保留這些學者各自的論證架構和推理過程，下文分別討論各位學者的文章，而不依照主題來區分。在結論裡，本文將嘗試探討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考量後現代主義空間論述之政治變革潛能的可能出路。

貳、地理學中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結盟與辯論

一、朵琳·瑪西：彈性的性別歧視

一九八九年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分別出版了《後現代地理學：批判的社會理論中空間之重置》(*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和《後現代性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之後，空間論述以及人文地理學家在後現代論戰裡的地位，廣受注目，並且確立了學術的正當性。朵琳·瑪西(Doreen Massey)於一九九一年發表

了影響廣遠的文章〈談性的性別歧視〉(Flexible sexism)，正是以索雅和哈維的後現代論述為批判對象，有力地揭露了聲稱激進的人文地理學之後現代論述的性別盲目。

瑪西首先針對索雅的《後現代地理學》提出她的批判，指出索雅有兩個層次的主要弱點，其一是寫作風格和正文結構上的問題，其二是論證上偏重資本主義與生產，而忽視其他向度。

首先，瑪西指出，後現代的視角容許各式各樣觀念和文化的多元性，但是這種兼容並蓄的民主，卻也有失去判斷標準的危險。不過，後現代主義的允諾之一是要讓那些以前被排除、被壓抑的人發聲，因此知識份子的解放性角色之一，就是幫助這些群體發言。在這個角色的扮演上，瑪西認為索雅的寫作風格艱澀難懂，圈外人難以接近，不是一種溝通，而是自我展現，這正透露了後現代論述中，學院知識份子的危機和維繫霸權的心態。也就是說，從某個方面看，後現代主義論述是西方白種男性學院知識份子面對變化的社會情勢，感受到失敗、無用和使不上力的危機，而做出的反應，企圖恢復他們搖搖欲墜的傳遞真理的學院權威。這種創造出精英中心與邊陲的做法，和後現代主義剷除層級的解放傾向正好相悖。

瑪西也指出，索雅雖然宣稱後現代反權威、容納多元聲音和打破線性敘述方式的立場，但他在建構所謂的「後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時，卻違反這些正文寫作策略，忽視了反例、不符其論證的其他主題，以及偏離其建構之正軌的學者。

其次，就理論立場和論點而言，瑪西認為索雅雖然點出了專注於資本與勞動分析的不足，而提及其他的壓迫機制和對象、其他社會權力關係的軸向，例如第三世界人民、弱勢種族和女人等等，但索雅還是以生產關係為重，並沒有認真對待他自己提出來的其他權力和支配關係。再者，索雅對現代性的界定也完全是關連於資本主義來定義，而不及於其他面向。在界定後現代主義時，瑪西認為索雅只以空間的重要性來定義，卻沒有提到後現代的其他主題，例如一致的後設敘事、單一作者與觀點的權威，以及統一的(unified)普同主體等的崩潰。此外，索雅一再提倡空間在後現代時代中的重要性，卻沒有予以適當的解釋，而其關於空間在存有論上之重要意蘊的討論則是一般性的論點，而未關涉特定的時勢。因此，綜言之，索雅的《後現代地理學》其實還是個現代的正文。

最後，索雅在書中所舉出的洛杉磯之實例分析，在瑪西看來，一方面犯了現代主義視覺優越論的錯誤，另一方面則是個權威觀點和疏離觀察的範例，是索雅本人的作者觀點，而非他所宣稱的各種不同視野的呈現。

相較於索雅書中顯示的女性位居邊緣的曖昧後現代立場，瑪西認為大衛·哈維根本就忽視了女人和女性主義觀點的存在，是個徹底男性氣概的現代主義敘事。瑪西就此

舉出了許多例子，包括哈維書中關於電影《藍絲絨》(Blue Velvet)和《銀翼殺手》(Blade Runner)的分析，忽視了女性主義的評論，而完全以白種男性的立場發言；以及書中第一部份採用了五張女性裸體的圖片，哈維卻未考慮到其中掌有權威之男性觀看位置的意涵，也就是說，現代主義之視覺優位性、觀看之位置性(positionality)，以及其中的性別權力關係等議題都被省略了，哈維因此無法觸及現代性、再現(representation)、空間與社會關係的整套重要論證。

瑪西特別提到，從後現代立場批判現代主義的空間向度，必須考慮女性的議題。她以繪畫為例，指出城市是性別化的(gendered)；例如公共和私人的分野，將女人監禁在郊區與家的私領域之中；又如現代性之經驗的具體代表人物是遊蕩者(flaneur)，他在人群中閑蕩，觀察而不被觀察，這個人物是男性，因為值得尊敬的女人不會在街上獨自遊蕩，同時女人也不能觀察別人；再者，遊蕩者的凝視通常是充滿色欲的，而女人只是這種凝視的對象。因此，現代主義/現代性的定義、產物和記錄，都是圍繞著特殊的性別關係、男性氣概之定義與女人之界定而建構的。

哈維在整本書中一再提及再現的危機，但是將危機的成因只歸諸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和彈性積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完全忽略了再現危機的政治向度，尤其是女性主義對於現代主義之再現模式的批評。瑪西認為哈維因此將後現代藝術做了無關政治的解釋，例如哈維將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一系列自拍像攝影作品，解釋為對主體面貌之多變的耍弄，而不涉及任何社會批評，但是，在女性主義觀點看來，雪曼的作品卻正是針對父權視覺的支配性快感提出了挑戰。哈維在書末主張歷史唯物論要整個改變，容納各種差異和「異己」(otherness)，但是最重要的異己——與性別有關的議題——卻在其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析中缺席了。瑪西以為，哈維獨尊階級，而將其他議題附屬其下，這種統一解放之鬥爭的做法過於一廂情願，而且忽視了左派內部的差異和衝突。

瑪西宣稱她自己的立場還是支持現代主義計劃裡主張變革、有希望的進步，但是對於支配性的現代主義計劃的不當之處，還是要提出批判。她也認為，女性主義其實早就提出了許多後現代主義提出來的議題，女性主義批判現代主義，卻未落入後現代主義的陷阱，沒有淪為部落主義(tribalism)。女性主義著重歷史和差異，沒有拋棄理論，也可以分析性別和階級等議題。索雅和哈維卻忽視了如此重要的女性主義之貢獻，瑪西以為，原因是他們還停留在以西方白種異性戀男性為普遍之歷史主體的狀態，以作者身份書寫著學院裡的正文，而未加反省。因此，瑪西特別籲求對於知識份子詮釋世界的角色、學院的階層關係、知識與權力的糾結等，提出更深刻思考。

二、里茲·龐蒂：後現代主義的女人空間？

相較於瑪西集中批判索雅和哈維的著作，里茲·龐蒂(Liz Bondi)在一九九〇年的〈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地理學：女人的空間？〉(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Space for Women?)一文中，比較一般性地回顧了地理學對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以及女性主義者可以如何回應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並以知識的性別編碼與差異的問題為焦點。

龐蒂認為，地理學裡所討論的後現代主義有三條線索，分別是指涉建築風格、文化變遷和社會理論。後現代主義做為一種建築風格的討論，連繫上了整個文化經驗與再現之重大轉變的討論，地理學家在這種討論之中的貢獻，乃是就時間和空間的層面來探討這種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的深刻變化，就此龐蒂舉出哈維的「時空壓縮」概念為代表。龐蒂認為這種對於空間的關注，引領地理學家探討做為社會理論之批判的後現代主義，並且建構了從時間和歷史的優越性邁向空間之復現的地理學轉向，將後現代主義對於後設敘事和鉅型理論的批判，予以地理學式的重鑄。結果，大部份社會理論裡的整體性(totality)之根源，被連繫上時間的單向性，而空間則被認為是鼓勵拋棄普遍原則，轉向差別、地方性的論述。

龐蒂認為地理學與後現代主義的相遇，只是延伸了地理學家對於社會生活之空間與環境裡的社會關係的興趣，不過，大部份的地理學家傾向於將後現代主義綁縛在物質性的社會現實上，因而排除了較為激進的論點，即沒有任何現實是物質性的(即現實都是論述中的現實)，在相互競逐、自由浮動的影像中做選擇時，也沒有任何立足基礎。龐蒂因此認為，地理學界由於急於要確保輸入的知識和既有的範疇相容，而未能盡取精粹，而且這種現象在牽涉女性主義和性別議題時最為明顯。目前雖然性別歧視的語言用得少了，但龐蒂認為謹慎地避免使用明顯性別化的語言，事實上是一個新的策略，藉以逃避思索性別在知性實踐中的重要性。

龐蒂認為後現代理論裡的空間隱喻，例如將以前被支配敘事排除或壓抑的異類、不可再現(unrepresentable)的事物，比喻為某種(差別)空間或異邦，而且還和時間(流變)對立起來，使得地理學家很興奮。但是，女性氣質和空間與存有(being)之間的連結，卻被有意地忽略了，亦即地理學家忽視了將女性定義為非男性、異類和不可知的西方哲學史傳統，沒有看到這些二元論的性別意涵。不過，龐蒂認為女性主義地理學家針對這種情況的回應，不應該只停留在堅持(女性與空間)編碼上的相關性，因為後現代主義正是要走出二元對立(男性VS.女性，時間VS.空間等)的困局，玩弄逆轉和重新編碼的可能性。縱然如此，龐蒂也承認，不論男性氣概和女性氣質的編碼多麼不穩定，女性主義的分析還是要堅持性別關係和性別層級的現實，不能就

此輕易地予以抹除。

相較之下，雖然後現代主義察覺到了西方知識傳統中的男性偏見，但是它伴隨了先入為主的性別象徵論，而犧牲了有血有肉的女人和男人；也就是說，觀念上的性別編碼，脫離了真實的性別權力與政治，知識與實踐脫節。所以，龐蒂主張要區分清楚「將空間編碼為具有女性氣質」，和「女性在地理空間中的存在」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最後，龐蒂針對主體和差異來談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分合。後現代主義是反基要論(anti-fundamentalism)和反本質論(anti-essentialism)，強調主體的分裂和主體之間的分化。女性主義陣營裡則有一支要召喚一個統合的女性主體，來對抗啟蒙男性的主體，但是這種做法忽視了女人之間在文化、權力和經驗上的差異。龐蒂指出了兩種差異概念：「位置性」和「經驗性」的差異，前者認為性別位置是一種象徵的建構，而後者則認為性別是一組社會關係，是真實的經驗，女性主義的地理學者不僅要在這兩種立場間協商，也要善用差別和位置的空間意涵，在空間的差異上看到性別之間與之內的差異。終究，女性主義對「差異」的日漸敏感，可以確保其不會喪失政治意圖，淪為後現代主義的激進相對主義所導致的政治麻痺。

一九九二年，龐蒂和多莫許(M.Domosh)合著了〈異類地方的異類人物：論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地理學〉(Other Figures in Other Places: 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一文，提出了另外一些論點。

龐蒂和多莫許首先引用普洛賓(Probyn, 1990)以地域的(local)、地域(locale)、地點(location)、情境(situation)、位置(position)等空間性的隱喻和指涉，來談論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之間的政治對話的文章，藉以指出我們身處特定時間和地方的具體脈絡之中的事實，以及地理學發問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龐蒂和多莫許宣稱要在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邊界中，引入一個更積極而具自我批判性的地理學聲音。

首先，龐蒂和多莫許說明了她們的女性主義立場比較偏向後結構主義，而非自由主義或激進的女性主義，亦即她們贊同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對立是一種建構與正當化性別差異的機制，而非不可避免的天生特質。不過，在父權體制裡，某種性別位置是無可避免的，因而除了批判其意識形態的建構外，「女人」也是一個可以積極利用的位置(亦即策略性而非本質性的認同)。

接下來，龐蒂和多莫許歸納了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於地理學知識之支配形式的共同批判。當前支配性的地理學知識，有幾項錯誤的假設：(一)真理是普遍的，沒有脈絡，與特殊的時空無關；笛卡兒(Descartes)式的時空座標預設了一個外在超越的觀觀點，而否認我們的視野偏於一

方，這種普遍視野也預設了一個被標示為男性的統一之理性主體，女人則被界定為「異類」。(二)知識必須是客觀中立，不受研究者或知識之生產條件影響，並且可以複製驗證。(三)研究者必須抽離其歷史、社會或個人的世界，以疏離的態度面對其對象。(四)呈現與傳遞知識的語言是透明的媒介，不會積極地塑造論述和意義。(五)二元對立的思想架構。以上這些假設也透露了地理學論述在科學和性別中立的假面下，暗藏了男性支配與陽物中心論(phallocentrism)。

龐蒂和多莫許接著從女性主義立場出發，批判後現代主義，她們認為：(一)女性主義的貢獻經常被男性的後現代理論家所忽視或排除，而且女性藝術家的創造經常是激發理論與哲學討論的「第一層」文化產品，而男人則藉之建構「高層」的文化正文，宛如女性「工藝」和男性「藝術」之間的對立。(二)女性主義對於啟蒙主義傳統的批判，可以說是後現代主義的先驅或原型，但這種關係未被提及，即使提到女性主義也是聊備一格，或與其他處於從屬位置的群體放在一起；而且佔有優勢的後現代理論家的位置，也不同于弱勢的女性主義者，必須認清其間性別權力關係的差異。(三)後現代主義雖然批判了統一超驗的權威主體，並且主張主體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卻未曾丟棄其男性氣概的權威，還是一個男性主體。(四)後現代的理論家採用了許多性別化的隱喻，也視「女性」為男性氣概的啟蒙思想的另類出路，但這種「女性化」和女性主義的變革計劃無涉，反而是一種「性別觀光」，到(女人)異邦採擷資源來利用，而且延續了女性的刻板印象。(五)因此，後結構主義的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不同，兩者不能類同；女性主義關切特殊的、連繫上個人的性別支配，而後現代主義只談論一般性的支配形式；再者，後現代主義消解了一切陳述之間正當化的真理判準和權威，只有權力決定一切，但女性主義者若放棄了真理和權威的宣稱，則無以和性別歧視戰鬥。

最後，龐蒂和多莫許主張，後現代主義對女性主義政治的貢獻不大，以空間的指涉來連結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也不是偶然而毫無問題的，而地理學的重要任務就是探究和脈絡化當代論述中，這些字面上和隱喻上的空間性(spatiality)。對於空間性的更敏感處理，應該更仔細地考慮不同聲音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和情境性(situatedness)，而地理學的事業應該要能重新配佈「下層」(subaltern)被「自然化」的土地，使她發聲，並且被聽到。

三、琳達·麥道威爾：歧異與多重聲音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一九九一年的〈嬰兒與洗澡水：地理學中的歧異、解構與女性主義〉(The Baby and the Bath Water: Diversity, Deconstru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in Geography)一文，強調女性主義地理學必須認識到女人之間的「歧異」(diversity)，而這對奠基於女人有普同一致利益之假設的女性主義理論和政治，都提出了挑戰。

麥道威爾認為，一九八〇年代社會與政治的變遷帶動了學界的反省，而其特色是有意識地承認歧異和差異，實在論(realism)(註1)、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和「地域性」(locality)研究，都將複雜性、偶然性和特殊性置入其觀點之中。麥道威爾指出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雖然從聚焦於女人的空間行為、性別角色，到性別認同的社會建構，在理論上一直有進展，也強調地理的差異，但還是預設了女人被壓迫的普同性，各種理論範疇也繼續使用種族中心和二元對立的概念，尤其是公私領域之分。因此，麥道威爾特別提出三個方向來討論歧異與差異的概念，以提倡能夠容納女人之間的差異的理論。

首先，在英美的女權運動中，不同種族和階級的女人經驗，挑戰了白種中產階級婦女以自己經驗當作女人普同經驗的做法。其次，女性主義人類學與發展研究裡的辯論，注意到西方概念裡的種族中心論問題，亦即第三世界女人與西方女人之間的差異，以及「女人」這個範疇的文化建構受到了關注。第三，後結構主義理論挑戰了作為西方知識傳統之核心的層級性和對立性的範疇，包括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等，並且挑戰了語言和意義的固定性，指出二元對立其實是一方優於另一方的權力支配關係，普遍的宣稱其實是特殊脈絡與特定意圖下的建構。因此，女人與男人的範疇不再是固定且一致的，差異於是被釋放出來。

麥道威爾也指出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及解構論的不同，就在於政治意圖的有無。女性主義強調的不是「真實」的任意性，以及在各種選擇間做判斷的不可能，而是理解和對抗女人所遭受的集體(而非普同一致)壓迫的重要性。認識到女人之間的歧異，還是可以有聯合的政治聲音。

一九九二年麥道威爾又出版了〈多重聲音：在「計劃」之內和之外發言〉(Multiple Voices: Speaki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ject')一文，討論女性主義的學院知識份子如何面對自己的位置，面對男性支配和男性觀點的學術體制與理論，進而對改變女性受壓迫的處境有所貢獻。麥道威爾指出，雖然現在幾乎每個人都是解構論者，差異、歧異、異類、情境性、位置性、眾聲喧嘩(polyvocality)等字眼琅琅上口，卻未見到對女性主義論點和革命計劃的關注，只是對後現代主義的兼容並蓄的閱讀，女人還是被邊緣化。不過，麥道威爾也點出女性主義的知識份子身為學院成員，同時是在既有的體制之內和之外，因此，特別要注意和由男性支配的既有理論的關係。

麥道威爾接著分辨後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不同，以及後現代主義某些主張的危險。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都拒斥了普同性的概念，例如普遍理性、普遍主體等，而隨著先前被邊緣化的異類聲音被聽見，自我的片斷化之性質也逐漸被承認，二元對立的概念也被各種邊緣之間的差異，以及邊緣與支配位置之間的差異所代替。但是，邊緣的異類從來就沒有能夠接近中心主體的位置，所以，對於正要伸張力量的弱勢而言，拒斥主體是不利的；再者，後現代主義常強調正文的策略，而不是政治的策略，並且提出再現的危機和作者權威之死，但如此一來，未曾發聲的女人就在主體碎裂和作者已死的宣稱中，失去了說話機會。因此，歡頌一個缺乏力量的邊緣性，不過是替男性知識份子解除罪咎感。

麥道威爾主張我們不只是一要看差異而已，最重要的是要看差異和正文藉以生產的權力和剝削之結構，而且要顛轉和重構目前構造了這些差異的權力關係。而為了達成變革社會的政治目標，我們應該涉身於將我們自己重構為主體和客體的歷史、政治和理論過程，而非只是贊揚我們自身的解構和片斷化，在此同時，也不能否認女人之間的差異。在我們的正文分析裡，不論我們如何再現「異類」，除非這種再現有其政治脈絡和基礎，我們就會陷入以前地理學對於「原始」和「異國風情」的著迷。在女性主義的知識份子身兼學院內外位置所發出的多重片斷的聲音之中，必須要有一個清楚的政治計劃，才能推動社會的變革。

四、吉拉汀·普瑞特：經驗、理論與實踐

相較於前述幾位女性主義地理學家的理論性批評，吉拉汀·普瑞特(Geraldine Pratt)在一九九三年〈反思後結構主義與女性主義經驗、理論和實踐〉(Reflection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Empirics,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以她自己關於職業區隔和家庭的經驗研究，檢討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吉拉汀·普瑞特的經驗研究指出，父權體制不是一個整體或系統，支配也不是全無縫隙，而且考慮其他支配關係(如階級)之後，情況就更為複雜了。吉拉汀·普瑞特據此認為：(一)性別沒有清楚的界線；(二)權力不是系統，而是變化多端且多重決定的權力關係之場域。吉拉汀·普瑞特便針對這兩點來檢討後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

首先，關於性別做為一個分析範疇的穩定性，在後結構主義否定了主體之本質，而主張主體性乃論述之建構的影響下，性別不再是固定的範疇，而是有內在差異且被階級、種族等穿透的文化建構之產物。但是，當女性主義解構了性別這個核心的分析範疇之後，卻造成自我解構的威脅，判斷的標準、社會批評的立足點都沒有了。

其次，後結構主義放棄了系統和整體性的概念，任何理論提供的都是部份的解釋，而且真理有其脈絡，亦即沒有絕對的、中立的、理性的知識。對女性主義者而言，「知識乃社會之建構」這個論點可以接受，但是許多人會堅持「性別壓迫有其真實性」，認為後結構主義傾向於相對主義，會造成強權即真理，這對弱勢者非常不利。

因此，普瑞特指出必須要謹慎區分女性主義的學術和行動、理論與實踐。最好是將解構設想為批判理論的一個階段，而非最終目標。女性主義做為一個社會運動，必須使用本質化和整體性的解釋，以便建立認同和政治力量，但是批判理論家的任務之一，正是要持續質問這些範疇和解釋。日常生活具有特定結構的事實，以及女性主義改革社會的政治投注，可以避免後結構主義滑入未經批判地頌揚多元性和獨特性的危險。此外，主張知識是一種建構，並不意味理論的解釋可以任意而為，也不是說不再有必要從事經驗研究。經驗研究藉由探究特定脈絡裡，男人和女人經驗的共同與差異之處，有助於建立聯盟，而且差異的結構不僅要在理論上探索，也需要有經驗性的探究，而地理學家的貢獻就在於指出主體認同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建構方式。

參、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辯論中的空間隱喻

第二節裡所介紹的文獻，雖然都是地理學界的發言，但這些文獻除了指出當前地理學界對於女性主義的忽視，以及概略提到空間隱喻在後現代之差異論述中的盛行之外，並未仔細探討地理學在這場辯論中能夠扮演的角色。龐蒂和多莫許的文章確實提及要在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邊界中，引入一個更積極而自我批判的地理學聲音，但她們只是主張對於空間性的處理，應該更仔細地考慮不同聲音的位置性和情境性。相對於此，本節將討論直接從空間隱喻切入的相關文獻，比較清楚地指明地理學做為一門空間學科，在女性主義與後現代的理論論述中的相關性。

一、吉拉汀·普瑞特：空間隱喻與發言位置

吉拉汀·普瑞特于一九九二年在《社會與空間》(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期刊發表的評論文章〈空間隱喻與發言位置〉(Spatial Metaphors and Speaking Positions)，首度比較有條理地歸納了當前後現代理論風潮中的空間隱喻。雖然這篇文章並未明白提及女性主義，而專就位置性(positionality)與知識的關係中，所牽涉的空間隱喻之正負意涵來討論，但還是為我們開啟了探究空間隱喻的視野。

普瑞特的問題意識是：「位置性」這個後現代的風行

概念，雖然質疑了普同性的敘述，指出多重的發言位置與知識的脈絡性(contextuality)，卻也有將發言者禁閉在其位置上的後果，而且觀看視角的多樣化也有可能使各方敵對的狀態更為複雜，使某些差異有本質化的傾向。因此，普瑞特扣著位置性與知識的問題，探討空間隱喻到底質問了位置性，還是遮掩和複製了傳統知識的主體位置。

普瑞特區分了三種空間隱喻，分別牽涉了移動能力(mobility)的修辭(如遊牧、旅行、遷移、遊蕩者)、邊緣性(marginality)和放逐的位置，以及做為一種地方的邊境(borderland)。首先，移動能力的隱喻通常表示了持續移置(displace)中心和邊緣之界線的慾望，是一種挪移控制之參照點的策略，這也意涵了對於固定的身份認同和範疇的質疑。普瑞特認為聚焦於移動能力，以及認同和社會範疇的流動性，有複製優越而無所限制的觀察者的危險，移動中的觀點，可能成為來自烏有之處(nowhere)、沒有根著的、超然的觀點。如果要對堅實的政治問題有所回應，就必須承認某些認同的穩定性和社會根基。再者，關於主體性之流動不居的說法，聯繫上移動能力的空間隱喻，對於地方的保存、關照和創造會有不良影響。我們不能僅看到定居與地方的反動形式(如某種偏狹的社區或民族主義、部落主義)，便走向另一個極端而主張流動不定；我們必須正視人們創造她們自己的地方和記憶的正當性。

其次，關於邊緣性的隱喻，和移動能力的措辭一樣，也代表了打破支配性霸權觀點之範疇與權威的慾望。邊緣被認為是抵抗的基地，抵抗支配性文化的殖民；邊緣是容許想像另一種存在方式，以及創造反霸權文化的機會的空間。不過，雖然邊緣性的隱喻可以用來質疑位置性，但是它也鼓勵了差異的僵滯化(永遠的邊緣?)，以及認為自己位居支配社會「之外」的錯誤假設。其實，我們都位居支配社會「之中」，也都與敵人有某種程度的共謀，邊緣與放逐的隱喻掌握了差異，但卻使我們漏失了我們和支配者的相同之處。

第三，關於邊境的隱喻，普瑞特認為它對於思考差異與呈現(presence)的政治最有啟發性，因為這個隱喻的焦點從個人轉移到了由社會所建構的地方。邊境充滿了不平等、支配、強制性的排斥；邊境乃是用來建構差異的社會與政治構造(例如國界)，但它們同時也是關係性(relational)的地方，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彼此產生關係的所在。人們在邊境之中生活，並且對照著他人(other)來建構自己(self)。

綜合來看，普瑞特顯然比較偏好邊境的隱喻，因此，普瑞特最後指出，我們必須前瞻人們不得不彼此對話的地方和情境，而且這種對話承認了衝突與真正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的社會建構與可穿透性。就像邊境一樣，那是一種社會建構的地方，是劃分差異的界線，也是不同事物與

人群交匯的所在，是至少說著兩種不同的語言，但是能夠相互溝通的地方。

二、派翠西亞·普萊斯—查利塔：空間隱喻與女性主義政治

派翠西亞·普萊斯—查利塔(Patricia Price-Chalita)的〈空間隱喻與掌握權力的政治學：在地理學裡為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描繪一席之地？〉(Spatial Metaphor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Mapping a Place for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Geography?)一文於一九九四年發表，是地理學界在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會遇中，首度清楚討論空間隱喻之角色的文章。

普萊斯—查利塔認為，在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相容性之論戰中，探究空間議題很重要，因為這可以替想要運用後現代取向來分析，又不想失去女性主義的政治承諾的人開啟一扇窗，亦即她認為空間為政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首先，普萊斯—查利塔檢視當代女性主義作品中的空間語彙，發現有兩種用法。當這些學者提到她們身為有色的、同性戀的、經濟地位低的女人之弱勢時，傾向於以移置(displacement)來描述她們的經驗，這時她們所擁有的是否定她們的空間，或是在修辭上被建構為某種「負空間」(negative space)或「非地方」(non-place)，例如她們提到被一致化、被邊緣化、邊陲的、外面的，而這些在政治上的負面用詞，則各有支配性的相對用詞，如有所安置的、中心化的、內部的等。此外，有些作家將其認同描述為一種負面空間或非空間，例如邊境，也有作家將位居支配性的女性主義論述之外，描述為「無家可歸」，同時也從不同女人的邊緣處境和位置，批判了白種、中產、異性戀、西方的女性主義主流論述，提倡女人之間的差異。

相反地，當她們提到掌握權力(empowerment)時，她們就佔用空間(appropriate the spatial)，亦即她們以佔據或重新評價既有的地方，或創造一個新空間，來描述她們爭取現身、份量和聲音的鬥爭；簡言之，她們以正面的空間語彙來提出政治陳述。例如，主體通常被描述為一種位置(location)，這種關連了身體特性(性別、膚色)的位置，定出了女人在社會關係中的地位 and 遭遇，以及認同的形式(如Rich, 1986)；又如許多作者描一種立場(standpoint)認識論(例如Harding, 1986)，採用空間性的認知與行動方式。立場暗含了位置性，是一種站立的基礎(ground)和抵抗的基地(site)。有些人則將其鬥爭根著於隱喻上的「家」，創造一個符合多重自我的新家。有關差異的鬥爭，也經常以空間的語言來描述，例如位置、定位、情境等。此外，還有人重新評價在支配論述中被認為沒有力量的空間和地方，例如將邊緣詮釋為一個抵抗的基地(bell hooks, 1990)，或者翻

轉對立性的空間關係(從邊緣到中心)。

普萊斯—查利塔接著討論這些空間性的正文措辭，對於重新思考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她認為對這些運用空間詞語的學者而言，她們同時提出了重要的認識論陳述，亦即她們提出了空間性的認知與行動方式，而寫作對她們就是一種鬥爭的基地。書寫、空間與抵抗，在這些學者筆下糾結在一起。例如她們引用地圖(map)這個隱喻，來強調我們所知皆屬建構，而非既定的真理，地圖不僅並非如實呈現世界的工具，實際上藏有許多空缺和縫隙，地圖還可以是重造和抵抗既有權力關係的導引。因此，地圖這個隱喻一方面指明了支配性的知識經常透過空間來建構世界，地圖代表了觀覽一切的視覺權力，沒有被放入地圖的事物，就等於不存在；另一方面，對於變革社會的計劃，地圖也提供了動態的、認識論的裝備，來展示新的行動與認知方式，而非只是作為既有事物的目錄清單。

接下來，普萊斯—查利塔扣著女性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糾結，來探問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是否能夠從使用空間語言和隱喻建構做為掌握權力之工具的非地理學界的女性主義者那裡得到信心，或者，必須繼續對任何後現代主義保持戒心？普萊斯—查利塔認為，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可以從前述的討論中，學習到如何以解放、掌握權力與政治的方式，來使用奠基於空間的正文策略。不過，雖然利用空間性的正文策略來批判普同的、霸權的現代性很有啟發性，但是，有些後現代主義的學者所從事的工作，其實是將身為異類的女人「空間化」。例如，最明顯的做法是將女性等同於空間，然後指稱兩者都缺乏政治，或者無法政治地行動。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否定了空間與政治之間的積極關係(普萊斯—查利塔舉弗列德瑞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理查·洛蒂〔Richard Rorty〕為例)。再者，有些原本享受了普遍視角之好處的男性學者，現在自願選擇站在邊緣，宣稱作者已死，宛若遊戲一般，也令被壓逼在邊緣(而無法選擇)的女性主義者十分憤怒。

後現代主義論述中，盛行將空間擺放在比時間優越的位置，並非意味著將女人也放在優位。普萊斯—查利塔引用愛麗絲·賈汀(Alice Jardine, 1985)的看法，認為後現代主義學者之所以將空間置於時間之前，是企圖掌握威脅要吞噬支配敘事的異類(女人)之空間，因為藉由觀察和空間的分類來認識異類，對於控制和支配異類非常重要。因此，恐懼未知的事物、控制未被馴服的東西、藉由知識來獲取權力，以及試圖維持現狀，都是後現代性中間乍興的理由，這是原來佔有優勢的男性知識份子的「生存策略」。同時，女人在某些後現代學術論著之中，也成為最受歡迎的分析載具，而非分析主體本身(例如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理論)。綜言之，在現代與後現代的思想裡，都將女人和空間等同起來，而這是一個父權計劃，

希望藉此「認識」並控制做為異類的女人。

最後，普萊斯—查利塔提出兩個待解的問題：一是我們所談論的是什麼樣的空間？二是我們談論的是哪一種後現代性？就前者而論，普萊斯—查利塔認為當代女性主義學者所提的空間和地方，乃是相互競逐的、建構的，永遠在流動(flux)中的空間，它不是固定的，也不能夠宰制整體化的現實，而是邁向可能之世界的導引。就後者而論，後現代性的詮釋通常落在抽象且表面的層次，如美學、生活方式、心靈狀態等，相形之下，女性主義者強調當前的社會時勢既具體且具有政治性，而邊緣性、旅行等等，不必然如後現代主義之論述所言，只是有趣的活動，它們也可以是變革的強大力量。

三、吉莉安·羅絲：弔詭空間的政治學

吉莉安·羅絲(Gillian Rose)於一九九三年出版《女性主義與地理學：地理學知識的局限》(*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批判了地理學知識傳統裡的男性建構與支配。雖然羅絲並未標舉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但其主要論點，即對於男性均質理性主體之建構的批判，與後結構主義對於啟蒙理性以降之核心主體的批判一致。

羅絲在這本書裡扣著知識、權力與主體性的糾結，分別就地方感、日常生活的空間、地景概念，以及空間分工等地理學的主題，揭露其中的男性氣概之知識建構。在最後一章裡，她探討了各種女性主義論述裡的空間意象(spatial imagery)，藉以提出女性主義主體建構的空間區位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容納女性之間的差異，而抗拒男性的普同性之主體建構與知識和空間宣稱。

羅絲對照了男女兩性在空間經驗上的差別。女性在空間裡的經驗通常是艱困的，甚至有時會讓女人想要從空間中消失。女人可以說是被監禁在空間之中，那是一種束縛，一種範域的縮減(shrinking of horizons)。這種感受通常藉由身體的動作與感覺表現出來，女人深知自己被觀看、被評價，因此經常小心翼翼、輕聲細語，不使自己「出醜」，成為笑柄，這造成了一種無時不在的自我審查，希望自己看起來沒有差錯，而且是對於男性凝視而言沒有差錯。因此，具有威脅性的男性凝視，物質性地將其權力刻畫在女人的身體上，透過一種關於女人被觀看與佔有空間的自覺，而建構了女性主體。

相形之下，男性對於知(to know)的能力與權力，以及對於空間和領地的權利宣稱，構成了一個透明的主體，這個透明澄澈的意涵不僅是由於「無所不知」的知識宣稱，也是對於相應之空間領地的完全支配(藉由地圖的繪製而顯現出來)。男性的主體在這種通透無礙的想像下，建構為一個從烏有之處(nowhere)觀看各處(everywhere)的主體，

而自己宛若不在場，沒有身體。更甚者，這個地盤其實是由暴力所護衛著(例如國族國家的疆界)，卻以理性知識的姿態出現。

羅絲用同類(same)和異類(other)來解說男性與女性主體之間的不平等地位，與知識建構的關係。在男性的知識與空間邏輯裡，一切都可以歸諸於同類，一切事物和空間領域，在其理性知識中都可以被窮盡和認識，但這其實是因為那些異端和與其不一致的東西都被排除或壓抑了，但男性知識主體卻宣稱能夠為一切異類(女人、少數族裔、第三世界等)發言，因為理性知識無所不知。依據女性主義的觀點，男性的同類主體之建構，其實必須依賴異類的存在，雖然異類似乎是在同類邊界之外，但是異類其實是同類的一部份。同類不僅必須對照異類才能確立其地位，而且同類的內部充滿了異類(內在差異)，只是被忽視或壓制。宣稱代表所有女人的自由主義之女性主義，其實也是壓抑了女人內部的差異，墮入男性知識主體的同類邏輯。

因此，強調差異的女性主義政治的空間意象，便不是均質的空間，而是認定女性主義的主體就是一個差異的所在(site of differences)。黑人女性、女同性戀、第三世界女人、勞工階級婦女等各種不同的女人，使得女性主義主體之建構所映繪(mapping)的必須是多向度的社會空間，而不是簡單的二元對立。但是，羅絲特別指出來這種向度的多元性還不夠，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在每一個向度上我們都同時佔有兩極，同時在中心與邊緣、在外面與裡面；同時在同類/異類的二元對立裡，也在此對立之外的其他地方(elsewhere)。

羅絲將這種在看似互斥的兩端同時出現的差異與矛盾之地理形勢，稱為弔詭空間的政治(politics of paradoxical space)，她認為如此一來才能夠打破僵固的二元對立，發揮游移不定、曖昧模糊的顛覆潛能，並且真正容納與正視各種差異，而不是完全認同主流同類，但實為同類/異類邏輯裡的異類，或是自我放逐為永遠的異類。當然，這時候的空間本身，也不再是知識權力的通透澄澈之穩定基礎，而是矛盾弔詭的不穩定之政治領域，是爭論、抵抗與可能性的差異之多變幾何形勢。

肆、結語：女性主義的基進空間論述

綜合以上各位女性主義學者的論點，我們可以發現她們的立場頗為接近。雖然在批判啟蒙普遍理性的知識傳統與現代性之整體性霸權上，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有相通之處，但女性主義者懷疑後現代論述的政治企圖(維繫既有的知識地位)，以及在實際學院體制和理論建構中的性別歧視與性別盲點。因此，面對後現代論述中豐富的空間隱喻，女性主義的地理學家也十分謹慎，一方面揭露其性

別意涵，一方面試圖將這些空間隱喻和女性主義的批判與政治連結起來。

但是，女性主義的地理學家在將當前理論論述中的空間隱喻扣連上政治時，一方面經常只是援引了非地理學界的女性主義者的用法，而較少從地理學本身豐富的空間研究線索出發；另一方面，前述空間隱喻的政治運用，比較侷限於正文策略，忽視了其他層次的空間政治(politics of space)。本文最後便嘗試提出幾個女性主義的基進空間政治可以進一步開展的方向。

一、性別化的空間——空間的性別政治 / 性別的空間政治

後現代論述中常將女人和空間聯繫起來，但如普萊斯一查利塔所述，這種聯繫有其反動的政治意涵。不過，空間並非性別中立，而是銘刻了性別權力關係，也是性別權力關係的構成要素，這種觀點已經廣為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接受，也延續了地理學界中關於「空間與社會之關係」的辯論成果：社會關係銘刻在空間裡，而空間也是構成社會關係的基本向度。立足於這種辯證的觀點，性別關係、性別主體與空間形式之間的複雜關連，可以在許多不同的層次解析——從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到心靈空間，從空間之生產、消費與控制，到空間之表徵與表徵之空間，從在地、國際到全球，從建築物、街角、都市到區域，從空間隱喻到空間實踐。女性主義地理學者在這些相關課題的經驗研究與正文分析中，對於性別與空間之繁複糾結的釐清，正是解析空間所蘊涵的性別政治，以及探索性別議題之空間政治的基礎，也是地理學者對於女性主義政治的獨特貢獻。

二、差異：邊緣、放逐、邊界——跨越邊界

關於「差異」的課題，經常聯繫上邊緣與中心對立的空間隱喻，不僅身為異類的「女人」相較於主流論述是位居邊緣，非主流的有色勞工階級同性戀女人，相較於白種中產階級的異性戀女人，也是位居邊緣。更甚者，邊緣不僅被中心所界定和控制，中心也需要邊緣才能構成其中心地位，沒有邊緣就無所謂中心，亦即異類乃主體之所以構成的要素。所以，邊緣與中心這一對概念，一方面是相生相成的，一方面又有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如前所述，羅絲(Gillian Rose, 1993: 151)便扣著異類(the other)脫離不了同類(the same)的論述場域，以及同類需要異類才能構成的弔詭性質，指出同時位居「在內」與「在外」的位置，同時位居邊緣與中心，以及同時位居同類 / 異類之間與之外，有其顛覆的潛能，而提出所謂的弔詭空間的政治學。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這種中心和邊緣的區分，在當前批評論述中的危機：邊緣做為激進之論述生產空間的重要性被中心化了，也就是說，邊緣異類的存在以及被承認，其實是既有的中心救亡圖存的策略，而異類

就此被歸為永恆的邊緣(參見Alice Jardine, 1985; Price-Chalita, 1994; 朱耀偉, 1995)。

「放逐」意味著永遠位居邊緣，對於視邊緣為最佳戰鬥位置的人，也許甘之如飴，但是對於數千年來一直被排擠在權力中心之外的人而言，放逐卻是長久的煎熬，因此，這個隱喻的爭議性比邊緣和中心的對壘還要大。

至於邊界這個概念，如果做比較正面的解讀，意指了不同性質的人事物的接觸地點，是可能展開對話互動、觀察到彼此差異之處的地方。但是，邊境也常是位居邊緣之所在，體制的控制也許較弱(像美國十九世紀的西部)，但是在這種邊境地帶，強權盛行，弱者反而缺乏保護；或者，邊境地區的體制控制反而較嚴，因為要對抗邊境另一頭的異類敵人(如南北韓邊境、金門前線等)。

因此筆者以為，邊緣、邊境和放逐等隱喻，都同時有其正負意涵，對女性主義者而言，重要的應該是檢討其間所蘊涵的複雜之實質與象徵性的權力關係，而非做為單純的論述之隱喻。相較於邊緣、邊境和放逐的固守一方，筆者提出「跨越邊界」或是「逾越」(transgression)這個具有積極行動意涵的隱喻，對應於當前女性主義評論中對於「扮裝」(cross-dressing)的豐富討論(例如Garber, 1992)。扮裝是跨越僵固之性別界線的行動，質疑了性別範疇的穩定性，並且在扮裝的行為中，滑脫了固著主體位置的控制企圖，而可以不斷游移，找尋有利的陣地。「跨越邊界」則更為廣泛地指涉了各種社會範疇與邊界的突破，不過，這個隱喻當然還是有其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例如，非法入境台灣的大陸客，和到大陸觀光的台灣人，兩者所跨越的邊界可能一樣，境遇卻有天壤之別。)

三、移動：旅行、遊牧、流動——連結網絡

涉及移動的隱喻，如旅行、遊牧和流動，也是後現代、後結構與後殖民論述裡的流行用詞。「理論的旅行」所意指的不僅是理論四處傳散，也是指稱理論本身的性質(Clifford, 1992)，那是一種離開，一種距離化，一種流動不居的理論。對於批判了鉅型理論(grand theory)、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整體性(totality)、中心主體、普遍性宣稱的後現代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而言，旅行所代表的是不斷游移，沒有起點和終點，沒有固定的位置，沒有無所不知的觀照點，所以，有人用「遊牧」代替旅行(例如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關於「遊牧主體」[nomadic subject]的觀點)；或者，用個比較「中性」的字眼：移置(displacement)。女性主義者也常援用這種自由自在地移動、打破束縛的隱喻(如Probyn, 1990)。

但是，除了帶有正面批判固定、僵化的範疇與中心權威的意涵外，女性主義者也不會忽視「旅行」這個字眼與現象所連帶的權力不平等。旅行一向是男性的專利，男人出外游走閱歷，女人則綁縛家中。旅行所扣連的社會關係

和文化想像，一直是以男性為中心；能否旅行、如何旅行，正是牽涉了性別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因此，在使用旅行這個隱喻時，要先解構其男性氣概的意涵，揭露旅行現象中的性別關係。此外，旅行也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征服歷史脫離不了干係，西方人的探險旅行乃是對於「異邦」的掠奪與控制，而這正平行於對身為異類的女人的控制。因此，性別、帝國主義與旅行三者糾結起來的問題叢，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參見Blunt,1994)。

此外，旅行這個隱喻所代表的流動不居和四散分離，很不利於女性的集體行動。也就是說，當女人終於開始形成主體，建構認同時，男人卻說已經沒有固定的主體和認同；當女人開始佔領位置和地盤，準備固守時，男人卻說讓我們旅行去，天涯海角四處游牧。因此，女性主義者主張，既要出外旅行，也要固守地盤，創造屬於自己的地方，既要遊歷四方，也要有休養生息的家。例如米罕·莫利斯(Meaghan Morris,1988)便提議運用「汽車旅館」(motel)這個隱喻，它同時是一個逃脫出遊的地方，也是一個「家以外的家」(關於當前文化批評裡旅行隱喻的更多討論，可以參見Wolff,1993)。

不過，在各種資訊、資本、勞動、符號與影像流轉全球，而「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取代「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Castells, 1989)的時代裡，對應著旅行和游牧等隱喻，筆者想要提出一個更為適切的隱喻：網絡(network)。在流動空間裡，重要的其實是網絡，它將各種不同性質的地方連繫起來，當資本和知識霸權已經完成自身全球網絡的連結時，與之對抗的力量，例如女性主義，也要儘快形成自己的網絡，或者以自主的方式扣接上既有的網絡(全球的所有網絡其實都將以某種方式連結在一起，例如電腦網絡)，才能將各有差異、不同位置上的女人結合起來，互通有無、相互支援。當然，網絡這個概念也不是免於權力的，總是有所謂的「節點」或「核心」成為網絡中的控制樞紐，支配了處於網絡末端或外緣的地方。不過，由於網絡上的各點能夠連通各處，這種節點的中心性(centrality)比較沒有那麼穩固和絕對，甚至，網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去中心的(de-centered)。

四、定著：家、社區、地方、地域性——去領域化/再領域化

自從維吉妮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要求一個「自己的房間」以來，女人要求有屬於自己的地盤的聲音就不斷湧現，因此，家(home)、社區(communitiy)、地方(place)，乃至於地域性(locality)，就經常成為女性主義者佔取生存空間、鞏固對抗父權體制之堡壘的隱喻。

當然，女性主義者並不是要一個既有的社會關係和表意系統下的「家」、「社區」，甚至「國」。因為家的意義對許多女人而言，並不是一個溫馨的避風港，反而是辛

勞的家務勞動場所，甚至是一個充滿恐懼的地方(例如Minnie Bruce Pratt (1984)扣著她自己的生命歷程，討論了家的各種不同意義)。而社區、國家、地域、地方等，實際上經常是束縛女人的所在，而非女人可以安身立命、追求自我實現的立足點。

不過，如前所述，在流動的年代裡，以及在流變不居的旅行之外，女性主義若要「扎根」，還是需要一個固著的地方。因此，面對「移動」與「定著」這兩種需要與力量之間的張力，筆者以為卡倫·卡普蘭(Caren Kaplan,1987)所提議的「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這一組隱喻頗為適切。這組隱喻來自於吉列斯·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費力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合著的《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1983)一書。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是指資本主義破壞傳統的習俗與社會關係，並代之以其他壓迫形式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解構與重構社會符碼與支配結構的過程。德勒茲與瓜塔里特別扣連著慾望來討論這一組概念，簡言之，馴化並且範圍慾望的生產性能量，以便壓抑慾望的過程，即「領域化」，而將物質生產與慾望從社會性的壓抑力量解放出來，則是「去領域化」或「解碼」(decoding)。據德勒茲與瓜塔里所述，資本主義藉由顛覆傳統上限制與控制社會關係與生產的符碼，而「去領域化」了慾望。不過，這個過程裡，資本主義又傾向於將一切社會關係化約為具有普遍等值性的商品關係(交換價值)，因而將之「再領域化」到國家、家庭、法律、商品邏輯、銀行系統、消費主義、精神分析，以及其他常規化的制度之中。

放在女性主義的空間政治裡來談，女性主義運動也可以利用「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的解構和重構之雙重操作，來對抗主流的「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力量；這組隱喻一方面有旅行的逃離和鬆動既定權威的意涵，一方面也有重劃地界、創造屬於自己的地盤的作用；去領域化將既有的社會—空間範疇與地勢拆散解構，然後依照(各種)女性的利益來予以再領域化，重新塑造社會地景。當然，與前述的一切隱喻一樣，去領域化與再領域化也可以是支配者控制異己的手段，帝國主義抹除原住民原來的疆域，依照自己的需要來重劃地界，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不論是跨越邊界、連結網絡，或是去領域化和再領域化，不論是放逐、旅行，還是家與社區，一切的空間修辭，正是由於浸漬在實際複雜且多變的社會關係與權力關係之中，而且同時是其構成要素，因之沒有固定的正面或負面意蘊；空間隱喻的意義端視鬥爭的各方如何使用而定。不過，就像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最大不同，在於政治承諾與社會改革之意圖的有無，任何空間隱喻，乃至於空間性的實踐，都需要搭連上性別與空間的政治，才不會淪為理論的囈語，而能發揮實效。

註釋

註1: realism這個字，在文學與美學裡譯為「現實主義」或「寫實主義」，但是在哲學裡，尤其是指涉當今英國與地域性研究有緊密關係的科學哲學，一般譯為「實在論」。

參考文獻

附記*者為本文主要評介文獻

朱耀偉

1995 〈當代批評論述中的「空間化」迷思〉，
《當代》105: 14-25。

Blunt, Alison

1994 Travel,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ry Kingsley and West Africa.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Bondi, Liz

1990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Space for Women?", Antipode, 22 (2): 156-167.

*Bondi, Liz & M. Domosh

1992 "Other Figures in Other Places: 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199-213.

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Clifford, James

1992 "Travelling Cultures", in L.Grossberg, C.Nelson & P.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 96-112.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3/1972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1987/1980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Garber, Marjorie

1992 Vested Interests: 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 New York: Routledge.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ooks, bell

1990 "Marginality as a site of resistance", in R.Ferguson, M.Gever, Trihn T.M., & C.West (eds.) Out There: Marginal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pp.341-344.

Jardine, Alice

1985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plan, Caren

1987 "Deterrit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 Cultural Critique, 6: 187-198.

*Massey, Doreen

1991 "Flexible Sex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9: 31-57.

*McDowell, Linda

1991 "The Baby and the Bath Water: Diversity, Deconstruction, and Feminist Theory in Geography", Geoforum, 22 (2): 123-133.

*McDowell, Linda

1992 "Multiple Voices: Speaki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ject'", Antipode, 24 (1): 56-72.

Morris, Meaghan

1988 "At Henry Parkes Motel", Cultural Studies, 2 (1): 1-16 & 29-47.

*Pratt, Geraldine

1992 "Commentary: Spatial Metaphors and Speaking Posit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241-244.

*Pratt, Geraldine

1993 "Reflections 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Feminist Empirics, Theory and Practice", Antipode, 25 (1): 51-63.

Pratt, Minnie Bruce

1984 "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 in Elly Bulkin, M.B.Pratt & Barbara Smith (eds.) 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Brooklyn: Long Haul Press. pp. 11-60.

*Price-Chalita, Patricia

1994 "Spatial Metaphor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Mapping a Place for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Geography?", Antipode, 26(3): 236-254.

Probyn, Elspeth

1990 "Travel in the Postmodern: Making Sense of the Local",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pp. 176-189.

Rich, Adrienne

1986 "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in her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1985.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pp. 210-231.

*Rose, Gillian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oja, Edward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Wolff, Janet

1993 "On the Road Again: Metaphors of Travel in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Studies, 7(2): 224-239.

Young, Iris Marion

1990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Linda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pp. 300-323.